

# 中国现代金融史

龙一飞 编著

一九八〇年九月廿四日

一九八〇年三月

# 中国现代金融史

龙 一 飞 编 著

一九八〇年三月

## 翻 印 说 明

龙一飞先生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授予经济博士学位。解放前执教于广西大学。解放后，先后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执教于山东经济学院。

龙先生在山东经济学院任教期间，曾编著《中国现代金融史》一书，文化大革命后，又经过多次修改，现已定稿。

本书可作金融专业教材或参考之用，经征得龙先生同意，由我等三校联合翻印，谨此说明。

山东省银行学校  
广西银行学校  
武汉市财贸学校

一九八〇.三.十四.

# 中国现代金融史目录

## 绪 论

- 第一节 五四运动后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 (1)
- 第二节 中国现代金融史是在阶级斗争中演变... (12)

## 第 一 篇

### 国民党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金融体系

(1927—1949) ..... (19)

- 第一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金融体系的形成 (1927—1937)  
..... (19)
  - 第一节 垄断信用机构和业务..... (20)
  - 第二节 实行废两改元..... (30)
  - 第三节 实施法币政策..... (37)
- 第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金融体系在加强垄断中走向衰落  
(1937—1945) ..... (47)
  - 第一节 加强金融垄断..... (50)
  - 第二节 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56)
- 第三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金融体系的总崩溃 (1945—1949)  
..... (65)

第一节	法币的继续膨胀和崩溃·····	(66)
第二节	金元券的发行和崩溃·····	(70)
第三节	垂死挣扎的银元券·····	(76)

## 第 二 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 (1927—1949)·····	(81)
---------------------------------------	------

第四章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的产生 (1927—1937)·····	(81)
---	------

第一节 革命根据地的经济金融政策和措施·····	(82)
第二节 国家银行的建立和货币发行·····	(86)

第五章 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的发展壮大 (1937—1945) ·····	(101)
---	-------

第一节 解放区银行的建立和货币发行·····	(102)
第二节 解放区货币发行的方针和原则·····	(110)
第三节 解放区的对敌货币斗争·····	(118)
第四节 解放区的反假票斗争·····	(127)
第五节 解放区的农村金融工作·····	(132)

第六章 新民主主义金融体系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1945—1949)·····	(142)
---	-------

第一节 新银行的增设及其货币发行·····	(143)
第二节 对敌货币斗争的最后胜利·····	(146)
第三节 解放区银行业务进一步开展·····	(160)
第四节 解放区货币统一的过渡办法·····	(164)
第五节 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和人民币的发行	

..... (170)

第六节 开始肃清半殖民地半封建残余金融势力、加强  
金融行政管理 工作..... (176)

### 第 三 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形  
成 (1949—1957) ..... (195)

第七章 金融工作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重大作用  
(1949—1952) ..... (196)

第一节 金融稳定的实现..... (196)

第二节 支持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对资本主义经济成  
份的斗争..... (206)

第八章 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在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时期的全  
面形成 (1953—1957) ..... (214)

第一节 支持国营经济继续发展和各行各业的社会主义  
改造..... (215)

第二节 私营银钱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20)

第三节 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普遍建立..... (228)

第四节 新人民币的发行..... (235)

# 绪 论

毛主席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说：“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百年中，分为前八十年和后二十年两个大段落。这两大段落中，各有一个基本的带历史性质的特点，即在前八十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属于旧范畴的；而在后二十年，由于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便属于新范畴了。旧民主主义——前八十年的特点。新民主主义——后二十年的特点。”<sup>①</sup>毛主席当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算起的。根据这一历史时期的划分，中国现代革命史一般就从五四运动讲起。中国现代金融史与现代革命史有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现代金融史也从五四运动讲起。

## 第一节 五四运动后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就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间虽然经过反抗外敌或者改变现状的太平天国战争、甲午战争、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迄未能变更这样的社会性质。在这样的半殖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1952年版，第二卷，667页。

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仍然根深蒂固，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是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是被推翻了，但是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的统治。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的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力量。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并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这样的社会性质无疑地要给予中国金融以决定性的影响，使中国金融也具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五四运动以前中国金融的性质就是这样。

一九一九年发生的五四运动虽曾唤起人民群众，给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它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和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是干什么的呢？也是为着反帝反封建，但是也失败了，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sup>①</sup>

五四运动失败之后，由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深入发展，由于封建军阀的割据和混战，由于地主阶级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加重，中国社会和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不但没有丝毫改变，反而日益深化了。这可以从以下的金融事实看出来。

第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金融势力更为扩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帝国主义对中国金融事业的投资大为增加。在第

---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1952年版，第二卷，528页。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忙于自相残杀，无力东顾，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侵略曾一度放松。但在大战结束以后，它们在“回到市场”的口号下，又卷土重来，其势比以前更为凶猛。根据美国人雷麦的统计，在一九一四年，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银行和金融业的投资只有六百三十万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百分之零点四。到一九三一年，这项投资就增加到二亿一千四百七十万美元，占全部投资额百分之六点六，计增加三十余倍。如果加上帝国主义对中国政府的政治和经济贷款所增加的九千七百四十万美元，这项投资增加的比例就更大。①

(二) 帝国主义在中国开设银行的家数也大为增加。从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三〇年，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共四十四家，分支机构一百二十五处；银行家数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加三倍多，分支机构增加约三分之一。其中以日本增设的为最多，美国次之，英法等国又次之。这可以看出各帝国主义在中国金融势力的消长情况。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表面上是为着帝国主义对华贸易的便利，做一些汇出汇入和商业放款的业务。实际上，它们是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干尽了欺骗、剥削和一切阴谋活动的坏事。它们都有其本国政府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支持，都负有特殊的经济侵略的使命。它们在中国有不平等条约作根据，有治外法权作护符，更有租界作种种非法活

①：见所注“外人在华投资”，1959年商务版，51页。

据吴承明统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金融投资到1930年增加到三亿一千七百余万美元，计增加五十倍有多。见“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一书。

动的场所。由于中国海关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又为帝国主义商人所控制，而这些商人只肯同它们往来，它们就实际垄断着中国的国际汇兑，操纵着中国国际汇兑的汇价。由于它们的资力雄厚，它们就实际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阻挠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它们通过外债的收放，实际掌握中国的财政命脉，并从中进行种种政治阴谋活动。它们勾结中国的军阀、官僚、地主和一切反动势力，加强对中国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毛主席曾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上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sup>①</sup>这样，帝国主义在中国银行家数的增加最能说明，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侵略势力的增长和深入。

（三）帝国主义银行纸币在中国境内的流通数量也大为增加。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银行纸币不但包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直接发行的纸币，而且还包括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外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而在中国境内流通者，如美钞、港币等。根据统计，这些纸币的流通数量，在一九一二年为43,948,359元，在一九一六年为65,344,657元，在一九二一年为212,384,806元，在一九二五年为323,251,228元。由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计共增加七倍多。这样的增加程度是很惊人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帝国主义银行纸币的流通数量在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五年，竟大大超过中国本国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数量。在一九二一年，中国银行业的纸币发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1952版，第二卷，599页。

行数量只有95,948,965元,还不到帝国主义银行纸币流通数量的一半。在一九二五年,中国银行业的纸币发行数量只增加到205,006,026元,尚比帝国主义银行纸币流通数量少118,245,202元。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庞大。①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已深切感到帝国主义银行纸币在中国的罪恶作用,曾涌起一个拒用外国银行纸币的运动。当时上海人民拒用日本正金银行和朝鲜银行的纸币,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这个运动的压力下,帝国主义银行纸币在中国境内的流通数量曾有所减少。但自国民党反动政权上台之后,由于它同帝国主义的勾结日深,帝国主义银行纸币在中国境内的流通数量又增加起来。到一九三六年,它已超过一九二五年的数字,而达到360,819,442元。②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五四运动以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金融势力大为增加,对中国金融的控制更为加强。帝国主义在中国金融势力的增长使中国社会和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更为深刻。

第二,带着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业也在畸形发展。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中国民族资本的新式银行共增加186家(根据杨荫溥的统计是185家);其中有95家是由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三年增加起来的。如果从一九一七年算起,到一九二三年共增加131家。

---

①: 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50页,58页。

②: 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58页,60—67页。

民族资本银行的资本也增加了。在一九一二年它们的资本总额为36,254,919元；在一九一六年增为37,803,690元；在一九二〇年增为51,978,077元；在一九二五年增为158,160,471元。如果以一九一二年的指数为100，一九一六年便增为105，一九二〇年再增为144，一九二五年再增为438。其中以至五四运动以后，即一九二〇年以后，增加的程度特别大。①

这些民族资本新式银行的兴起和发展，表面上看，似可当作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当作一种可以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相对抗的民族力量。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这样。由于帝国主义金融势力在中国占着统治地位，这些民族资本的新式银行仍然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所支配，并为它们服务，因而带有极为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

首先，这些民族资本的新式银行是直接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服务的。当帝国主义的商品运到通商口岸，而欲转运到内地销售或者批发给口岸商人的时候，由于帝国主义银行在内地没有分支机构，对于内地商人的情况不熟悉，它们就需要中国民族金融机构（银行和钱庄）来接办这一段的信用业务，以便帝国主义商人的货物容易脱手。当帝国主义商人搜刮了中国农村的原料，而欲把这些原料集中到通商口岸的时候，其由农村到通商口岸这一段的信用业务，也是靠中国民族金融机构为它们经营的。帝国主义银行在中国进行高利贷的剥削，也是由中国的民族金融机构转手的。在此，中国民族资本新式银行的买办性质是很明显的。

其次，这些民族资本新式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买办资

①：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41页，51页。

本和封建军阀官僚地主的资本。“北京商业银行”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邓某投资开设的。这是买办资本的典型例子。军阀官僚地主投资兴办的银行更多。这些封建统治者看见银行投资的利润丰厚，就纷纷摇身一变，由封建主义身份变为民族金融资产阶级。他们投资兴办银行，同时就支配银行的行政管理，把银行变为他们封建割据的地盘。例如：交通系的梁士诒等以交通银行为中心，政学系的吴鼎昌等以金城银行为中心，都是众人皆知的事实。①至“中华懋业银行”，它纯粹是北洋军阀官僚勾结美帝国主义合资组设的，更是集中买办性和封建性于一身的显著例子。

最后，在政府的外债和内债的经营方面，这些民族资本新式银行的买办性和封建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许涤新同志曾经指出：“华商银行还替外资和中国政府做媒介。凡中国政府向外借债，其本息清偿常由华商银行参预管理，同时在华商银行资本的掩护下，外资就能更顺利地进行其经济侵略工作”，②这是民族资本新式银行在政府外债方面的买办作用。

在政府内债方面，它们的作用更大。北洋军阀政府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五年共发行国内公债十九次，合872,392,228元。这些公债实际上都由当时的银行承销了。由于公债的利息很高，折扣又大，而且公债还本付息的基金（即担保公债的关税、盐税等基金）又掌握在帝国主义手里，不怕军阀政府赖债，所以这些民族资本新式银行都把它们资金运用到公债的投机上。当时许多银行的开设，其目的就是同军

①：许涤新：“官僚资本论”，27页，42页。

②：许涤新：“官僚资本论”，15页。

军阀政府勾结，专门进行公债投机。但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并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用来作行政费用和打内战的军费。银行用高利向存户吸收来的资金，连同自己的资本，都用来购买政府公债，实无异于帮助军阀搜刮人民；助长军阀的内战，阻碍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就充分表现了这些民族资本新式银行的封建性。

上述事实说明，五四运动后，民族资本银行的畸形发展，不是民族产业发展的结果，不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是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扩张和封建军阀官僚统治的混血儿。这正表现了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更为深刻。

第三，本来带着封建性质的旧式钱庄业，在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的支持下，也不甘后人。

在一九一二年，上海南北两市的钱庄只有28家。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它们就增加到62家。由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六年，更增加为57家。它们的资本总额，在一九一二年为1,064,000银两，折合银元1,488,000元，平均每家资本53,100元；到一九一八年增加到3,109,000银两，折合银元4,390,000元，平均每家资本71,000元；到一九二六年更增加到13,411,000银两，折合银元18,757,000元，平均每家资本215,000元。①由一九一二到一九二六年，钱庄的家数增加三倍多；它们的资本总额增加到十三倍；它们每家的平均资本增加到四倍多；特别是在一九一九年以后增加得显著。

钱庄业这样的增加是同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分不开的。

①：“上海钱庄史料”，188页，191页。

钱庄的财力来源不在于它们自己的资本，也不在于顾客的存款，而在于它们能够发行大量的庄票。据估计，上海钱庄庄票的流通数量每年在二十亿银两以上，这个数字大大超过当时中外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钱庄庄票所以能够这样大量流通，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银行的支持。当帝国主义商人把货物运到中国通商口岸的时候，一些代销外国货的商人就请求钱庄开发庄票，以便持向帝国主义商人出货，因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银行只同意接受钱庄的庄票。中国商人代帝国主义商人采办土特产的时候，也通过他们的买办一样以庄票为支付工具。这样，中国商人和帝国主义商人之间的交易，就以钱庄的庄票为主要的支付工具。这就是钱庄庄票能够大量流通的原因。这就是上海钱庄势力的所在。但这势力是靠帝国主义银行的支持而取得的。

钱庄不但与通商口岸的帝国主义金融势力相勾结而成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同时还和内地的地主商人及内地的金融业如钱铺、典当业等相勾结，并供给它们高利贷的资金和包买土特产的资金。关于这点，一位钱庄大老板说道：“钱庄脉络，遍布各省大小城镇。过去上海各钱庄，客路收解，多者每日百十起，少者十余起。虽无分行支行之设，而穷乡僻壤，到处可以通汇。有指臂相连之效，无杆格不通之患。凡内地钱庄需要资金，无不量予接济。被农村及小工商业之周转，殆皆有赖于是。而每岁丝茶登场，钱庄必放出巨款，派员会同借款人赴产地采办，运沪出口，而后收回本息。其有助于输出贸易之发展，诚非浅鲜也。”①

①，秦润卿：“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载于“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周年纪念册”，78—79页。

可见，钱庄业是一手拉着通商口岸的帝国主义，一手拉着农村及小城镇的封建势力，而带有极为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它们的发展无疑地表示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性质更为深化。

第四，货币流通混乱状况依然存在。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货币的复杂性和地区性已相当严重。以银两来说，由于各地度量衡不一致，银两的成色重量也因地而异。主要的如上海的“九八规元”，汉口的“洋例银”，天津的“行化银”，不但是名称不一，就是成色重量也不一。在一九一二年，各地银两的名称、成色、重量不同，竟达103种之多。<sup>①</sup>就是封建社会普遍行使的制钱，各地有大钱、小钱、轻钱、重钱、优质钱、劣质钱之分。

帝国主义金融势力侵入之后，中国的封建货币制度是动摇了，但货币流通的混乱情形更为严重。因为这时又增加了银元的流通。而银元又有各色各种的银元，并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划分，而带有地区性。

五四运动以后，制钱的行使大致绝迹。比较流行的银两尚有上海的九八规元，汉口的洋例银和天津的行化银。比较流行的银元尚有袁头币，英洋（鹰洋）。货币的流通好像比以前简化一些。其实不然。制钱消失以后，各地流行的辅币有银角、铜元。银角对银元，铜元对银角，依照法令规定，是按十进兑换的。但是事实上，由于各地军阀政权的滥铸，银角对银元和铜元对银角的十进制并不能维持。同时各地所铸银角的成色重量是不一致的。就是同一地区铸造的银角也

<sup>①</sup>：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22—23页。



随时变更其成色重量。铜元也是一样复杂。除一般流通当十文、当二十文的铜元外，四川还行使当五十文，当一百文、当二百文的铜元。因此，各地银角兑换银元和铜元兑换银角的比例也是极不一致的。何况这时，除银两和银元两种货币单位并行外，又产生了银元单位和银角单位的差异。当大多数省份以银元为单位的时候，广东、广西两省却以银角（即毫洋）为单位，即以十个银角或五个双毫为一元。由于银角对银元早已不能维持十进制，银角一元对银元一元的比例也是经常变化的。

不但硬币的流通这样复杂混乱，就是纸币的流通也有同样情形。有代表银两的钞票，有代表银元的钞票，有代表银角（毫洋）的钞票和代表铜元的钞票。各地发行的钞票往往不能互相流通；这一些地区的钞票到另一地区行使，就要按照一定兑换比率补水或者贴水。甚至同一银行发行的钞票，印上不同地名，就不能在他地同一银行兑换。

当时货币流通这样混乱是同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侵略分不开的。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银行，发行钞票，首先破坏中国纸币发行权的统一。帝国主义支持旧式钱庄维持银两的使用，使银两银元两种货币单位长期不能统一。帝国主义暗中支持军阀的封建割据，相互混战，更使中国的货币铸造权和纸币发行权不能统一。所以，货币流通的混乱也是中国金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重要表现。

第五，封建军阀实行金融割据。

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国家。”<sup>①</sup>因此，任何一个帝国主义那时在中国

<sup>①</sup>：毛泽东选集，1953年北京版，第一卷，139页。